

说一切有部 佛教研究

说一切有部产生和发展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的古印度西北部广大地区，它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被认为是「小乘」的理论代表。说一切有部在中国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禅数学、毗昙学、俱舍学和法相学等形态，对中国佛教曾产生重要影响。

许潇◎著

说一切有部 佛教研究

许潇◎著



人人直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一切有部佛教研究 / 许潇著.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88-0558-7

I. ①说… II. ①许… III. ①佛教-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2627 号

说一切有部佛教研究

许 潇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95215(发行部) 64095363(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贺 兵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0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558-7

定 价: 65.00 元

序 言

佛教说一切有部产生和发展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之间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的古代印度西北部广大地区,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当地的西域文化都在这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铸就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论高峰。最能把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是说一切有部。也可以说,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其影响于此后的佛教哲学,极为深远。说一切有部对于中国佛教哲学及中国文化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传入中国后所形成的“禅数学”和“毗昙学”,成为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佛性论的理论依据,对中国佛教佛性、心性思想的萌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安世高来华翻译佛教说一切有部经典,传播说一切有部教义。他所翻译的说一切有部禅数学经典在佛教初传之时影响甚广,他对佛教名相概念的译介、对佛教世界观的介绍以及对安

般禅法的推广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从安士高第一次系统性翻译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开始,佛教义学以经典为载体开始传入中国。又由于说一切有部对禅学的深入研究,说一切有部传入中国之初就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禅数学。从安世高到鸠摩罗什,许多译师都对说一切有部的禅学著作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介绍。有的直接翻译了说一切有部的禅学经典,有的则对不同禅师的禅法进行了编译,形成了最早的汉文禅学典籍,他们对中国早期的禅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一切有部禅数学作为第一种系统性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在修(禅定)和学(佛学)两个方面对中国佛教产生影响,中国佛教的面貌由此而焕然一新。后来的中国佛教,不论是对禅的定义,对修禅的次第等都基本没有变化,有很多方法都直接沿袭了禅数学的方法。而在义学方面,禅数学的影响更既深且远。中国佛教学者针对佛性问题的禅数学、毗昙学阐发,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为涅槃学的流行提供了思想准备,大大推动了涅槃学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佛性思想。禅数学、毗昙学自传入开始一直到唐代俱舍学兴起的近千年时间里都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

禅数学的盛行使得中国佛教获得了非常高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佛教义学和禅修逐步展开。在而后的般若学思潮当中,禅数学、毗昙学始终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到了晋宋之际,一批罽宾僧人来华传教。说一切有部在中国的发展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开,表现在从禅数并重的禅数学转到以义理解释为重点的毗昙义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当中,在僧伽提婆等外国沙门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佛教学者精研毗昙,尤其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诸师的佛学思

想深受其影响,烙上了深深的毗昙学印迹。由于东晋社会哲学基础普遍较强,东晋佛教更强调对义理思想的探寻,加之道安及其弟子慧远等人的倡导,毗昙学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许多中国佛教学者纷纷开始研习。特别是其实有论、业报论以及其对“常我乐净”的追求,这些思想和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学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他们的观念,继而影响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学者早于涅槃类经典流行中土时就通过对更早传入的说一切有部毗昙的研究,自发地吸收、借鉴、扬弃毗昙思想,阐释了他们的佛性思想,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说一切有部毗昙是中国佛性思想的本源,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建构和承续发展的关联性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竺道生、慧远等人对佛性思想的早期阐发并非是照搬说一切有部的佛性论或心性论,而是依据毗昙的学说及其思想特色对佛性问题进行阐发的。这突出表现在竺道生、慧远乃至谢灵运等中国佛教学者们的佛性思想及其毗昙学印迹。毗昙学的核心思想是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自性不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更易于被中国佛教学者所接受,成为中国佛教学者尤其是道安、竺道生、慧远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佛教学者。东晋以降,人们对社会主流学术思想玄学贵无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出现了以裴頠、欧阳建为代表的崇有思想,而毗昙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与崇有论相呼应,中国佛教学者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印度所传来的佛教。

到了南北朝中后期,在更多经典的译介以及中国佛教大小乘观念的树立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下,说一切有部毗昙学开始衰落,而

《俱舍论》的译出加快了毗昙学衰落的历史进程。在慧远以后由于受到鸠摩罗什的大力破斥而很快趋于衰微,其部分思想和学术被唯识宗、华严宗和天台宗所吸收,遂逐步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但是毗昙学却不断衰微,尤其是玄奘重译《俱舍论》之后,俱舍学逐步取代了毗昙学在分别法相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而毗昙的学说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然有玄奘、法成等人翻译说一切有部论著,形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玄奘系统地将说一切有部的几乎所有论典翻译成中文,在他的影响下,唐代许多僧人尤其是唯识宗人对说一切有部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进了说一切有部在中国的最后的辉煌,表现出与南北朝毗昙学截然不同的特色。特别是圆测及其后学们,在研习传播法相唯识学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将大乘唯识学和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学说融合、互证,说一切有部学说成为法相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在中国亦流传久远,自鸠摩罗什开始,说一切有部戒律开始传入中国,到了唐代,说一切有部戒律文献几乎系统性被义净译成汉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义净还不忘为弟子讲授戒律,一时间有部戒律在京洛遍地开花。义净理论和实践并重,为中土僧团持戒修行的规范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许潇

2017年12月于结夏斋

目 录

序 言	(1)
-----------	-----

绪 论	(1)
-----------	-----

第一章 说一切有部的形成和发展	(27)
-----------------------	------

第一节 部派分裂与说一切有部的形成	(28)
-------------------------	------

第二节 巴克特里亚与说一切有部哲学的希腊化 ...	(36)
---------------------------	------

第三节 贵霜帝国与说一切有部在中亚的传播	(50)
----------------------------	------

第二章 说一切有部经论的初传与禅数学的流行	(62)
-----------------------------	------

第一节 安世高和说一切有部经论的初传	(63)
--------------------------	------

第二节 道安与禅数学	(72)
------------------	------

第三节 禅数学与佛教基本名相概念的译介	(88)
---------------------------	------

第四节 中国禅学的禅数学渊源	(108)
----------------------	-------

第五节 禅数学与中国佛教修学的初步建立	(123)
第三章 从说一切有部禅数学到毗昙学	(133)
第一节 僧伽提婆来华与毗昙学的传译	(134)
第二节 道安与《阿毗昙序》	(146)
第三节 毗昙学的流传与毗昙学派	(154)
第四节 毗昙学与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	(162)
第四章 说一切有部毗昙学的式微与俱舍学的兴起	(185)
第一节 说一切有部毗昙学的式微	(185)
第二节 俱舍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毗昙学的影响 ..	(188)
第五章 唐代说一切有部法相学	(191)
第一节 玄奘与说一切有部法相学	(192)
第二节 《三界图》与说一切有部法相学的发展	(200)
第六章 义净与说一切有部戒律在唐代的传播	(215)
第一节 说一切有部戒律概述	(216)
第二节 义净及其对说一切有部戒律的译介	(222)
结 语	(233)
参考文献	(237)

绪 论

佛教说一切有部产生和发展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6 世纪之间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的古代印度西北部广大地区,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当地的西域文化都在这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铸就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论高峰。最能把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是说一切有部。也可以说,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其影响于此后的佛教哲学,极为深远。说一切有部对于中国佛教哲学及中国文化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传入中国后所形成的“禅数学”和“毗昙学”,成为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佛性论的理论依据,对中国佛教佛性、心性思想的萌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说一切有部经论传入中国颇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系统性传入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然而,尽管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却没有形成中国佛教特有的“宗派”。又由于它是小乘佛教的理论代表,故而广泛地受到大乘的批判,在中国佛教大乘意识树立之后,其地位便越来越衰微。说一切有部的论著带有很强的分别法相的意味,这使得其论著常常被作为佛学入门教科书,特别是新有部巨著《阿毗达磨俱舍论》译出以来,人们对说一切有部论著的关注就仅仅是将《阿毗达磨俱舍论》作为佛教的工具书和入门书籍来看待,而对于它自身的思想特色以及新有部的理论则缺乏系统性关注。

以上简要概括了说一切有部自身的特点以及说一切有部在传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问题,而说一切有部的这些方面的特点显著地影响着近代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首先,正是由于说一切有部没有在中国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派或宗派,故而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宗派等研究视域下难有说一切有部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说一切有部经论的传译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很少为佛教史学者所关注。其次,说一切有部论著,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论藏(阿毗达磨)带有非常强烈的分别法相的意蕴,它在佛教史上长期被当作一种工具书和入门书来使用。而近代日本佛教学术研究本就是从传统佛教义学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于说一切有部的研究最初就是从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开始

的,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研究亦成为近现代学术界研究说一切有部最常见、最成熟的一种研究范式。日本学术界更是以“阿毗达磨佛教”来指称以说一切有部为核心的整个部派佛教。第三,说一切有部的思想特色十分鲜明,尤其与中国佛教主流相比较而言则更能看出其思想特色,如“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自性不空”等命题,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针对说一切有部佛教的部分命题和思想展开论述,深化了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第四,说一切有部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其影响范围非常广,尤其在西域龟兹、阚宾等地影响广泛,龟兹地区的许多石窟、壁画都反映了说一切有部的特征。学者们针对这些考古资料展开研究,成为说一切有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说一切有部在中国的影响广泛,先后形成禅数学、毗昙学等,因此学术界对说一切有部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方面致力颇多。正是由于说一切有部自身的种种特点决定了学术界在对其研究的过程当中主要就围绕着这些特点而展开的。依据上述特点并结合时间顺序,学术界对说一切有部佛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说一切有部佛教研究的勃兴

近代对佛教史和佛教学说展开学术性研究源于西欧东方学、印度学研究。自法国印度学家欧仁·比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84年出版《印度佛教史导论》开始,佛教研究建立起现代学术典范。而大约与此同时,沙俄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团长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us)则利用驻北京的地利优势全力攻读翻译汉文佛典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他根据说一切有部文献《异部

宗轮论》撰写的《古代佛教史纲》可以说是西方学者首次利用汉译佛教经典展开研究,他的研究对后来的欧洲汉学和东方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论著就常引用他的研究成果。到了 20 世纪初期,欧洲佛教研究逐渐形成古典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和法比学派等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列宁格勒学派以阿毗达磨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分析研究其义理内涵,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比利时学者蒲珊 (L. delaPoussin) 和苏联佛教学者舍尔巴茨基 (Th. Stcherbatsky)。尤其是舍尔巴茨基,他根据新有部巨著《阿毗达磨俱舍论》按照西方哲学的理路转述了说一切有部的哲学体系,完成了著名的《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一书,宋立道将其翻译为《小乘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蒲珊则将《阿毗达磨俱舍论》译成法文,此外蒲珊还译有有部阿毗达磨论书中的一些章节,甚至有《大毗婆沙论》的相关段落,在此基础上,蒲珊在其著作中深入探讨佛教的业、三身、缘起等哲学问题。其专著有:*Bouddhisme Opinions sur l'Histoire de la Dogmatique* (Paris, 1909)、*The Way to Nirvana* (Cambridge, 1917)、*Le dogme et la philosophie du bouddhisme* (Paris, 1930) 等。这一时期是以新的研究方法对说一切有部展开研究的最初阶段,一方面欧美学者尝试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说一切有部展开研究,特别是以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哲学,这些研究基本上将说一切有部的基本观念和哲学体系介绍到欧洲,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开始学习欧洲的新的学术研究方法,逐步展开了对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系统性研究。

19 世纪 60 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

究。佛教研究也开始勃兴,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首先以研究“阿毗达磨佛教”的形式展开。以木村泰贤的《阿毗达磨论书の研究》(大法轮阁 1968 年版)为代表,阿毗达磨佛教研究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该书首次以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论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成为后来学术界对说一切有部研究的重要参考范式。木村泰贤的博士论文乃是其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而成,受到西欧学术研究方法的熏陶和训练。然而,其开创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却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乃至中国的佛教研究。此后,相继有渡边其雄《有部阿毗达磨论研究》(临川书店 1954 年版),福田亮巖《有部阿毗達磨論書の發達》(永田文昌堂 1965 年版),水野弘元《阿毗达磨文献导论》(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95 册之《部派佛教与阿毗达磨》,大乘文化出版社),河村孝照《阿毗达磨论书之资料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 1974 年版),西义雄《阿毗達磨仏教の研究——その真相と使命》(国书刊行会 1975 年版),本幸男《阿毗达磨研究》(大东出版社 1982 年版)以及佐佐木现顺《阿毗达磨思想研究》(清水弘文堂 1982 年版)等专著相继问世。这些研究基本厘清了说一切有部的文献、基本思想及其在部派佛教当中的地位等问题,但是研究视角上囿于“阿毗达磨佛教”,偏离了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资料过分拣择,结论不乏偏颇之论。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其“阿毗达磨佛教”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印顺、吕澂等老一辈中国佛教学者,中国学术界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最早也是以阿毗达磨为中心的,如印顺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 15 卷,中华书局版),吕澂《阿毗达磨泛论》(《现代佛教

学术丛刊》第 95 册,1978 年版)等。吕澂和印顺对于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研究在中国并非最早的,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先后发表了《读异部宗轮论》《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等文章(《佛学研究十八篇》,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然而这几篇关于说一切有部的文章却并没有做更深入研究,其研究方法亦非严格的现代学术方法。而到了吕澂和印顺开始,中国学者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才开始逐步步入正轨。虽然受日本学者影响很深,但是已经能够自觉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和批判了。

二、说一切有部佛教研究的深入

由木村泰贤开始的阿毗达磨佛教的研究,经过老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是系统地梳理了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文献源流、考证了说一切有部的论师及其思想特色、归纳总结了说一切有部的哲学体系。为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转向了更加具体微观的方面,尤其是对说一切有部的涅槃观、法身观、九十八随眠,以及三世实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如河村孝照的《有部の涅槃觀三解脱門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66 年 3 月,第 209 页-第 214 页)、《有部の仏陀觀とミリンダパンハー》(《宗教研究》1976 年 12 月,第 140 页-第 142 页)、《一切有部の修行論》(《部派佛教》,佼成出版社 1977 年版)。河村孝照对说一切有部的研究非常深入,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自木村泰贤以来的“阿毗达磨佛教”的研究范式,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尝试探讨说一切有部的涅槃观、佛陀观、解脱观和修行论,在说一切有部的研究历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本庄良文的 *On the Abhidharmakosopayika by Samathadeva*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9年1月,第442页-第445页)、《三世実有説と有部阿含》(《仏教研究》1982年12月,第49页-第61页)、《阿毗達磨佛説論と大乘佛説論——法性,隱沒經,密意=あびだつまぶっせつろんとだいじょうぶっせつろん》(《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89年1月,第59页-第64页)、《毗婆沙師の三藏觀と億耳アヴァダーナ》(《佛教论丛》1991年1月,第20页-第23页)、《説一切有部の縁起説——舟橋一哉説の検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99年1月,第143页-第149页)等系列文章则从说一切有部的核心思想“三世实有”展开探讨,对有部的实有说和缘起论进行研究。相较于河村孝照和本庄良文的研究主要从本体论、解脱论上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田中教照和加藤宏道更加侧重研究说一切有部的修行理论,比如田中教照的《有部の無明論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7年3月,第182页-第185页)、《有部の四念住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83年3月,第14页-第18页)、《有部の修行道論と七覺支》(《仏教学》1986年3月,第33页-第47页)等文章以及加藤宏道的《断惑論からみた九十八随眠》(《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81年12月,第303页-第306页)、《有為の四相の定義》(《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91年3月,第35页-第39页)等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释了说一切有部的修行方法和修行层次。田中教照的《〈阿毗曇心論〉系と〈大毗婆沙論〉の修行道論のちがい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5年3月,第172页-第173页)、《〈法蘊足論〉と〈分別論〉の蘊・処・界論》(《仏教研究》1982年12月,第47页-第51

页)、《〈法蘊足論〉における修行道論》(《仏教学》1987年12月,第1页-第21页)以及《使品より見た『阿毗曇心論』の位置》(《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87年12月,第28页-第35页)等文章则力求从单一文本的深入分析入手,探讨说一切有部修行道论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将《阿毗曇心论》体系的修行道论和东方系的阿毗达磨师《大毗婆沙论》之修行道论的异同清晰地呈现出来。森章司的《發智六足論における四諦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6年3月,第56页-第60页)的研究方法与田中教照类似,他们都看到了说一切有部各论书之间观点的差异,因而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侧重以具体的单一的文本入手展开探讨。清水俊史的《说一切有部における与果と得》(《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014年3月,第1199页-第1205页)一文则尝试分析说一切有部五事中对心不相应行法的分类,力图阐明心不相应行法分类的深层内涵。楠本信道《〈俱舍論〉における世親の縁起觀——有部と經量部の十二支縁起解釋》(《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002年3月,第373页-第376页)一文通过对《俱舍论》关于十二支缘起的相关描述的研究,分析了说一切有部的十二支缘起和经量部十二支缘起的区别。

相较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态势,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热情不高,研究的随意性较强而且欠缺系统性。主要有韩廷杰的《略论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概括性地介绍了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江亦丽的《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探索》是国内首篇研究说一切有部哲学思想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收录于《法藏文库》。尽管受时代局限,有一些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她的研究范式、研究框架、